

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龙林, 刘 燕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社会基本矛盾”是毛泽东矛盾学说在社会层面的应用。这一概念深化了唯物史观对社会有机体的分析,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辩证认识,决定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毛泽东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强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运行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殊性的归纳,为不断解决这一矛盾指明了路径。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启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准确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正确认知当代各种矛盾关系,并通过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消除贫富差距,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87(2013)01-0021-04

一、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主要内涵及意义

1. 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

对毛泽东而言,从早年所创立的、以《矛盾论》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矛盾学说,经由《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社会所做出的“活生生”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法”分析,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这一发展是合乎逻辑并顺理成章的。事实上,《矛盾论》从名称上看虽是系统论述矛盾问题的哲学著作,但就该著作的最初动机和最终归宿而言,毛泽东对矛盾问题的分析重心是聚焦于社会层面的。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莱文(Norman Levine)指出的,《矛盾论》主要阐述了“进行社会探究”的原则,矛盾观念是毛泽东社会分析法的轴心,这一著作开辟了社会方法论的新天地^{[1](P471)}。

毛泽东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别归入“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范畴,而毛泽东则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范畴,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动因,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非但如

此,毛泽东不仅承认矛盾存在于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而且还像列宁一样区分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他认为,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将会消失;而非对抗性矛盾,无论在哪个社会以及哪个社会的哪个发展阶段都将永远存在。在这里,如果说“社会基本矛盾”是他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论概念,那么,社会基本矛盾中的“非对抗性矛盾”则是他借以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立足点。正是这个关键性概念,使毛泽东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既不同于佛教追求的那种泯灭了一切差别和矛盾的涅槃境界,也不同于斯大林等只承认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存在矛盾、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的“半截子”矛盾观。“毛泽东从来不当乌托邦主义的牺牲品。非对抗的矛盾永远存在的思想,使他不致相信救世主和千年幸福国度的未来。非对抗的矛盾永远不能从任何社会形态中消除的思想,使得毛泽东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论。由于从本体论上说,不可能消灭非对抗的矛盾,就有必要创立多种政治形式,以便这些矛盾、异议能够得以表现出来。”^{[1](P478)}这种评价固然不够准确,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开展整风运动、鼓励“四大”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由于笃信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

[收稿日期] 2012-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48);中山大学三期“211”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张龙林(1975-),男,陕西安康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刘燕(1970-),女,河北丰南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转型理论研究。

毛泽东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人类历史终有一天会停止发展、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人的发展最终状态的观点,批评这是“否认矛盾存在”、“否认辩证法”的“天真烂漫的想法”^[2]。他曾反复强调“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矛盾,没有一处不充满矛盾”,而且“总是充满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3] (P514-515)}。他从不把共产主义看成太平盛世,那里人类一切的忧虑和人与人之间摩擦都会消失,而是将它视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改进、人类迈向更大进步的新起点。毛泽东是永不满足、不懈追求新高度的具有理想主义性格的政治家,他的这一性格通过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概念得到了充分表现。或许,也正是因为发现了在历史运动趋向中“被规定的单纯性掩盖着”的矛盾^{[4] (P148)},才使得他始终信奉并坚持那种永不知足的进取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说是互为因果。

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也决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性质的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计并由列宁和斯大林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所隐含的那种消灭一切矛盾的观点也不符合他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他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看法。正因为如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敌人专政的前提下,突出了“人民民主”的内容,而这点则显然是以承认人民内部的利益和观点的差异为前提的。换言之,毛泽东所设计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他的社会基本矛盾概念为哲学依据的。

2. 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另一引人注目也是引起较多争议的观点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坚持认为,应该在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也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5] (P325-326)}那么,这种看法是否像有些人所批评的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理论困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思想呢?

事实上,“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5] (P325-326)}。从总的历

史发展过程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的确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的关系是确定而绝对的,如果随意颠倒,就会陷入唯心史观;如果将二者并列或轮流突出起决定作用,就会陷入二元论。但从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转化的。这样的认识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过类似看法,只不过不像毛泽东那样明确系统地阐述过。马克思说过“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6] (P7)}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 (P478)}列宁也指出,一个阶级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8] (P442)}。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和贡献。如果说,由于所处历史条件和所肩负历史任务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侧重于强调它的唯物主义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它的反作用,并进一步提升为“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历史的变革时期。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用革命或改革的手段去推翻或改变它,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时,还僵化地固守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公式”,等待着历史时机的所谓“成熟”,那就永远别指望会有新的生产关系推翻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发生以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如果当旧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新的、进步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和成长时,仍然死抱着过时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体制不放,社会就永远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他们各自辉煌的革命生涯中,都是勇于突破教条主义“本本”的闯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敢于打破种种禁区的努力和成就,也为毛泽东“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做出了精彩的注脚。

当然,真理多往前走哪怕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的侧重点的见解,如果将其过分夸大,就会造成挫折乃至灾难。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他确实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甚至有忽视他自己提出的“一

定条件”的倾向,把这一本来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原理夸大为无条件适用。这就是1955年急于求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左倾口号和行为的深层思想根据。对此我们也无须讳言。

3.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解决路径。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旨趣一致,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提出并非出自单纯的哲学理论的创造冲动,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着眼于分析、解决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和难题。因此,“社会主义”应当且必须成为准确理解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基本语境和关键所在。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区别于人类社会其他形态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做出了相当明晰的指示:其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处于“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相适应是主要方面,不适应是次要方面,无视于此,便会混淆社会主义与剥削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界限;其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并非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3] (P372-373)}。其三,社会基本矛盾归根结底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为两种性质相异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这里,如果说毛泽东的第一个观点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内涵,体现了在“矛盾运动”中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法精神的话,那么,第二个看法则道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表明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优越性及其自我完善能力的高度自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而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题目”^{[9] (P756)},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出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最终解决指出了一条明确的路径。

二、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当代价值

1. 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出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优越性的基本标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受限于当时的种种主客观条件,对社会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缺乏

深入的研究,难以深刻、准确地认识其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由此导致时时忽视从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简单理解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转向诉诸生产关系的革命,尤其是片面强调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对此,毛泽东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9] (P829)}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向前整体推进,也正归功于党和国家牢牢把握住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根本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当继续成为今后不断突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保证。尽管毛泽东在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实践曾导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重大失误,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社会基本矛盾特殊运行规律之科学性的依据,事实上,这反倒验证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经过30年多来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从“一大二公”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从“大锅饭”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调适和转变本身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矛盾又相适应的关系,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自我完善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非但没有阻碍反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邓小平说过:“制度是决定因素”^{[10] (P308)},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和推进,最终目标在于通向共同富裕,如果背离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政治前提,那么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势必重蹈旧辙。

推进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动力。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重要一环,上层建筑的能动性体现在直接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并最终影响到生产力能否得到解放和发展。从毛泽东时代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变革,到改革开放由“摸着石头过河”步入“深水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不仅显示出其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指出,应当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这一期望应当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社

会各界的奋斗目标。

2. 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各种矛盾及其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社会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11]。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关系中实现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社会各界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难点问题。在社会意识日趋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坚持以包括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指导,尤其体现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一,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反复强调,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矛盾普遍存在并持续存在,是一种世界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更是指出,即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也不会永远解决,而是走向新发展的起点。由于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背景,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不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各种矛盾难免更为集中和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尽可能充分地认可并正视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现实,既不能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扭曲矛盾的普遍、长期存在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间的关系,更不能漠视解决这些矛盾的紧迫性。

其二,辩证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一方面,我们应当科学区分当代现实中的主要与次要矛盾、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冷静认识到无论当前各种矛盾问题表现得多么错综复杂,人民内部矛盾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非对抗性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流。另一方面,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规律启示我们在保持对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自信的同时,须密切关注各种矛盾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预防次要、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主要、对抗性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7] P693} 我们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固然不能另起炉灶,但也要与时俱进。

(2) 坚持统筹兼顾,消除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矛盾关系的反映,问题的本质在于“物质生活资料分配与占有上的矛盾,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组合中的最主要矛盾”^{[6] P332}。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成为将人民内部矛盾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理论依据,也为正确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错

综复杂的矛盾问题指明了基本方向。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类型的划分——人民生活与发展之间、工农业之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阶层内部、阶层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超越时代差异的全面性、深刻性及科学性,仍然契合于目前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现实格局,理应成为我们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全、巩固社会稳定工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统筹兼顾的方针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和做法,对于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也有着指导性的启示意义。他指出:“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2] P228} 应该承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代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治理经验,通过统筹兼顾、合理规划来消除贫富差距,从而在根本上缓解、弥合人民内部矛盾,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以及更宽裕的实践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将经济发展做大做强的同时,给予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共同富裕以更多的关注和探索,最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扎实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 [1] [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 [2]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04-05.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0] 邓小平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罗]特奥多西乌.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当前问题[J].国外社会科学,1982(5).
-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王家芬